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胡愈之作品选
方 修編

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出版
81,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63-C, Jalan Sultan, K. L. Malaysia.
东艺印务公司 承印
1979 年12月第1版，订价 S\$ 4.20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前言

方 修

(一)

马华新文学中的政论散文，出现很早，一九一九年新文学开始发展的时候，已经有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产生。接着，二十年代后期的孙艺文，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的洪丝丝，则是更有代表性的作者，作品成熟，读者众多。一九四一年一月开始，胡愈之正式就任南洋商报的主笔，又把这种文学样式的成就推上一个新的高峰。胡氏这一年在报章上写的社论和专论，是战前的马华政论散文中最为出色的一批。

胡愈之，原名学愚，浙江上虞县人。他是文学作家，也是国际问题专家。他参加过早期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搞过翻译，搞过文学理论批评，出版过游记文学「莫斯科印象记」；有些记事怀人的小品文，清新俊逸，尤其是新文学作品中的一绝。中国抗战时期「鲁迅全集」在上海编纂，他是工作人员之一，这也是他对文学方面的贡献。但他在文学方面的才调却被他在新闻界的名气掩盖了。他历任哈瓦斯通讯社、东方杂志、世界知识、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等新闻或舆论机关的编辑或主编，经常撰写国际政治论文，因而以「国际问题专家」著称，知道他是搞文学出身的人反而少了。

此外，他还是一个名学者。他留学法国，专研国际公法，更精通世界语，曾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游历欧洲各国。在星马时期，也大力提倡世界语。他对于语言文字的研习似乎具有特别的兴趣与天份；星马沦陷时期，他与郁达夫一行避难苏岛，三年半的时间竟给他学到了很好的印尼文，最后一年还编写了两册书稿——「汉译印度尼西亚语辞典」和「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前者后来亡佚了，后者於四十年代后期返华时曾随身带去，一度用「沙平」的笔名在北京出版，本地书坊也到有一批。五十年代中期，北京的一些语文学家从事文字改革，设计汉语拼音，胡氏似乎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大约是前年底或去年初，我从香港的「抖擞」杂志（？）看到一则报导，说是胡氏在一九六六年以后曾经受到一些困扰，近年复出，已是八十高龄，却还精神矍铄地发表文章，宣布汉语拼音文字决在二十年内全面推行。由此，我推测胡氏的晚年，完全是以一个文字学家的身份，在致力汉字的改革工作。

然而，在星马读者，特别是四十年代初期的星马读者的心目中，胡氏的最确切的身份，应该说是个政论散文作家。他的那种每篇千余字、以报章社论的形式出现的政论散文，写得非常精彩，是成千上万关心国际政治问题人士每日必读之作；其吸引读者的魅力，不消说在本地无出其右，即使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样水平的政论家也并不多见。譬如金仲华的分析时局、乔冠华的谈论军事，内容可能比他更加坚实或深刻，然而都是一些汪洋开阖的长文；写起短篇的政论来，还是胡氏更擅胜场。胡氏的这一类文章的写作，似乎也是四十年代初期到了新加坡之后才更有用武之地，更有突出的表现。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他应聘来星主持南洋商报的笔政。由一九四一年一月起至翌年新加坡沦陷前为止的整整一年间，他每星

期要为该报撰写五六篇社论，每篇一千五百字左右；此外还不时给该报的星期刊写些专论，如「向马华学术界的一个提议」、「南洋的新时代」、「论南洋华侨两大会」等，每篇三几千字至一万字不等。商报晚版的简短的「时评」，似乎也有若干是他执笔的。但读者最多的还是他的社论。每天，（基本上是「每天」，但有时来了一两篇特稿，社论就把版位让出，）他的社论用四号字排印在报纸第一版的左下角，几乎占了四份一的篇幅，特别醒目，成了读者优先阅读的一个专栏。比起他前此在一些定期杂志上发表的专论来，这些社论自然是更能反映时局的急剧变化，更能适合读者的需要，也更能发挥他的特长，读者圈似乎也更加扩大了。

（二）

何以胡氏的这些社论能够风靡一时，吸引着当时当地广大的读者群呢？

首先，当然由於他是一个国际问题专家。他有丰富的学识，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分析力、以及准确的判断能力。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国际政治局势，经他条分缕析或旁敲侧击之后，常常使到一般读者顿觉视野宽广起来，看问题清楚得多了。所以大家都乐于每天花费十几分钟的时间来读他的一篇文章。这些文章即使在今天看来，我们还会感觉到那是一篇篇很有份量的作品，不是只凭敌忾的情绪来激励士气的宣传文字。例如一九四一年二月，胡氏一论再论，连续发表了六篇关于如何「保卫南洋」的社论，指出南洋正面对卷入战争的危险，然而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要避免战争，需有四件法宝，除了中国坚持抗战到底之外，其余的三件，其一是英美必需在远东方面合作。胡氏说：「美国在这一次战争中，对南北美大陆与远东，要求扩大投资与市场，以

继承欧洲交战国所遗的地位。但是英国，只能在美洲方面向金圆帝国让步，在南太平洋却依然故步自封，不愿意打开门户。为的是德国席卷欧陆之后，英帝国的经济重心，逐渐东移，印度马来亚与澳洲已成英帝国资源与贸易的生命线。换句话说，在南太平洋上，英国仍然是倾向保守的，而美国是进取的」。因而，要使南洋避免战争，英美在太平洋利益的矛盾必须设法消弭。其二是英美荷的对日禁运。胡氏揭露日本的作战资源及外汇，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取之英美及南洋各属；英美资助日本南进，也正如过去英国资助德意扩军一样。这种情形继续存在着，南洋的战争就不能避免；要是英美及南洋各属完全对日禁运，（像美国那样的局部禁运是绝对不够的，）战争便可能避免了。其三是南洋必须实施民主制度。胡氏分析：「以民主消灭独裁，在今日的南洋，是和在世界其他地方同样重要的。南洋各属，除了印度不计在内，就有一万万四千万的人口，比日本人口要多出一倍。这中间虽然包含着无数种不同民族，要是民主自由制度彻底实施，这使一万万四千万有自尊心的男女，为保护自己及保护自由的尊严而共同抵抗侵略，那时太平洋的形势就会不同。不但日寇不能欺骗诱惑，而且民主力量在南洋得到最后胜利，把德意独裁者在远东的帮凶，根本消灭，是不成问题的。」这种苦口婆心的劝说，实在是一种真知灼见。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南洋终于陷入了三年八个月暗无天日的日子。

一般读者所以爱读胡氏的社论，除了他是个国际问题专家，他的文章是了解波诡云谲的国际时局的富有启发性的读物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他始终以超越党派的立场，针对当时中国的政局，代表当地的读者说话，吐露出他们的心声。当时星马的华人，大都还是侨民身份，他们关心中国的命运，为中国的抗战局势忧心忡忡。他们担忧的并不是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而是政治上的落后

倒退。一九四一年这一年，中国的抗战已经晋入了第四个年头，但是重庆当局不但没有在军民大众的浴血战斗中坚强起来，反而愈来愈显得动摇与退步。行政的腐化，官吏的贪污，政治的专制，社会的糜烂，情况已是非常的严重，而且还有内部分裂磨擦、发生军事冲突的恶耗频频传来。这些事态，使到本地的华人社会感到无限的关切与焦虑。这时候，胡氏的社论出现了。他以忠诚爱国的民主人士的立场，无党无派，不偏不倚的态度，不断发出呼吁，力主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要求实行民主改革，澄清吏治，开放言路，……可说真正的成为了民众喉舌，舆论前驱。例如，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军事件发生后，胡氏反覆撰论申言：「我海外侨胞，其中最大多数，一向是无党无派的。我们心中只有国家民族，我们决不存党派偏私之见。现在大敌当前，失地未复，我们所要求的是抗战建国，民主团结，我们所反对的是和平妥协，是内战分裂」（「团结则存，分裂必亡」）；「新四军事变发生以后，我们所看到听到的海外报纸舆论，不分地域帮派，大多数人都主张拥护蒋委员长团结抗战到底。可见海外侨胞对于这次事件的观点和意见是一致的，而且不能不一致，亦不可不一致。不然，我海外同胞，要是有着党派偏见，主张扩大事变，增加磨擦，不但违反了侨胞无党无派的立场，亦且也是自取分裂亡国之祸」（「新四军事事件所引起的国内外反响」）。又如，在评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广播演辞时，胡氏特别赞赏「民主主义变为行动」这一个警句。他说：「中国的抗战是民族解放战争，是革命战争。中国要靠人民大众的力量以获得胜利，这是蒋委员长所迭次指出的。假如把人民的嘴都塞住，把人民的手足都缚住，怎能使人民自由参加抗战呢？蒋委员长曾经宣布政治要民主化，并且主张中国采取多党议会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从中央到地方，还没有一个真正民选的人民代表机关；在野的政党及政治

组织，始终没有合法的地位；至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这些民主政治的起码条件，也还没有充份保障。这样，我们被人家称为民主国家，是应该问心有愧吧」。再如，响应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说，强调「要让人民来讲话」（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支持南洋福建同乡大会通过撤惩陈仪徐学禹等贪官污吏的议案，认为「人民应有罢免权」（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等，所有这些话，都是说到当时绝大多数华文报章读者的心坎里去的。它的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共鸣，自是不难理解的。

胡氏的社论之所以广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笔的优美。他本来是个优秀的作家，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有很高的写作才华，因而写的虽然是议论文章，文艺性却很浓郁，流丽生动，完全没有普通报纸社论的滞涩枯燥的毛病，这就易於引人入胜了。通常一般报章的社论，很少被列入文学的范畴，但胡氏的社论却被视为政论散文的极品，可当文学作品来欣赏，其原因也在此。

（三）

胡氏於一九四二年初星洲沦陷前夕离开此地，避难苏岛；和平后返星办报，再度撰写政论，直至一九四八年三月经港赴华为止。因而他遗留在本地的政论散文，先后共有二批。第一批是一九四一年所作，另一批是战后初期写的。这里选辑的是他战前作品的一部份，载於当年南洋商报的「社论」栏。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目次

前言..... (方修)	1
对于改善闽政运动的具体建议.....	11
日本军事冒险的最近动态.....	14
论英美在远东的合作.....	17
团结则存分裂必亡.....	20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会见.....	23
再论保卫华南的重要性.....	26
新四军事件所引起的国内外反响.....	29
从纪念一二八说到远东时局.....	32
意大利帝国危机与欧战前途.....	35
四月危机与购取时间.....	38
美国走向战争的途上.....	41
投降主义的末路.....	44
感谢友邦新闻界的关心.....	47
马来亚怎样帮助日本作战.....	50
论罗斯福三大政策.....	53
加强筹赈工作响应劳军运动.....	56
评邱吉尔首相广播演辞.....	59

欧洲与远东时局动向.....	62
美国颁布租借法以后.....	65
论保卫南洋.....	68
再论保卫南洋.....	71
三论保卫南洋.....	74
四论保卫南洋.....	77
危机不在东方.....	80
中南半岛的争霸战.....	83
日本为什么提议调停战争?	86
太平洋风云紧急中的中国外交.....	89
泰越冲突的新发展.....	92
五论保卫南洋.....	94
六论保卫南洋.....	97
巴尔干局势的新发展.....	100
对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希望.....	103
论中英合作.....	106
日军又在北海登陆.....	109
不要忽视了粤南战局.....	112
纪念国父要实行三民主义.....	115
国父与华侨.....	118
日敌的第二步将是什么?	121
要让人民来讲话.....	124
民主主义变为行动.....	127
美国参战以后怎样?	130
美国舰队访问澳洲.....	133
对敌总反攻的必要条件.....	136
中国新闻学会宣言读后感.....	139

论东非战局及其影响.....	142
严防日敌汉奸破坏我金融.....	145
南斯拉夫加入轴心集团以后.....	148
欢迎南侨大会代表.....	151
我们需要陈主席.....	154
公意的胜利.....	157
人民应有罢免权.....	160
福建是福建人的.....	163

对于改善闽政运动的具体建议

闽省苛政，经陈嘉庚先生揭发，并向中央吁请改善之后，现在国民政府林主席及行政院已分别电覆陈先生，将其中有关于行政政策部分，由行政院派员澈查，其他官吏溺职部分，则由行政院咨请监察院令飭闽浙监察使署依法澈查。同时本坡福建会馆亦已决定于本月十九日召开闽侨大会，讨论促进闽政改善的具体办法。

闽政必须改善，现在已成为爱国爱乡的侨胞的共同认识，而且也是一千万福建人民的迫切要求。除了为陈仪徐学禹所收买或麻醉的，或者是故存偏私，背着良心说话的少数人们之外，已经没有人再能替贪官污吏辩护了。现在的问题，不在于闽政是不是需要改善，而在于如何改善闽政，以及如何发动海外闽侨的集体力量，以促成闽政的改善。

自然，我们相信中央政府决不会完全忽视陈嘉庚先生以及千万福建人民的请求，对于改善闽政，一定要有具体的办法。但是，一则在抗战时期，军书旁午，中央未必能专心改革地方行政机构，二则陈仪徐学禹等神通广大，爪牙密布，中央即使派大员澈查，亦易受其蒙蔽。因此要澈底改善闽政，必须是由福建民众协助中央政府，共同进行，方能收得实效。而我海外闽侨，所处环境较为自由，尤应首先发动改善闽政运动，以作后盾。所以福建

会馆召集闽侨大会，讨论改善闽政问题，这一件事是极为必要的。

现在本埠闽侨大会在五天以后，即将召集开会。我们特于事前，提出若干具体建议，藉以供大会提案讨论的参考，想为我爱国爱乡的闽侨所乐闻的。

第一，闽侨散布海外，约数百万人。应全体动员，方能收众志成城之效。动员方法，一方面可由各地福建会馆或其他侨团，发起改善闽政签名运动，请全体闽侨签名，汇送当地领事馆，转呈政府，或由华侨参政员转呈。另一方面则由本埠闽侨大会通过议案，召开全马闽侨代表大会及海外各属闽侨代表大会，务使各地闽侨皆闻风兴起，俾以群策群力，促成闽政之改善。

第二，闽政腐败，非自今日始，而改善闽政亦非一朝一夕之事，所以闽侨大会应发起组织一经常性的团体，如闽政改善期成会之类。并在各属各埠设立分会支会，与省内民意机关及民众团体取得密切联络，经常提出关于闽政之报告及改善闽政之建议。

第三，闽侨大会应通过改善闽政请愿案，提交闽籍各国民参政员及华侨参政员，请其在下届国民参政会提出。

第四，闽侨大会应向监察院及闽浙监察使署呈请澈底调查闽省官吏贪污溺职情事，秉公办理。

第五，改善闽政的根本办法，在于实行国父的民权主义，完成地方自治，使「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国民党政纲对内政策第六条）依照国父建国大纲，宪政实施之前，各省应完成地方自治，由人民自定省宪法，自举省长。现在中央政府已在准备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法，因此福建省应首先实行地方自治，自乡村保甲长以至县长省长，均由民选，并可由人民予以罢免。如是则贪污方可绝迹，而政治亦自可日见清明了。

第一项至第四项是改善闽政运动的治标方法。最后一项则为治本方法。我们希望闽侨大会讨论时，治本治标同时兼顾。而最重要的是使闽侨对于改善政治有正确的认识与一致的主张，假如能够办到这几点，则不但改善闽政，必可达到目的，而海外侨胞的国家民族观念也将因之而大为提高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南洋商报）

日本军事冒险的最近动态

自从去年九月廿七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以后，日寇的军事外交行动，已经改变了三次。从九月底到十一月中旬，欧洲方面轴心国家的气焰依然高涨。英伦三岛随时有被德军进攻的可能。意大利发动北非战争，攻陷英属索漠里兰，并向埃及西部进军。西班牙参战呼声甚高。美国正忙于总统选举，既没有表示明朗的援英态度，更没有准备应付远东意外事变。日寇认为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所以一方面企图从外交方面，运用德国，更通过德国运用苏联，以压迫中国屈服投降，结束中日战争。另一方面则以陆军在海防登陆，并由同登侵入越南北部，胁迫越南政府，签订日越协定，以作南进的军事布置。

但由于欧战形势的突然变换与对中国抗战的估计不足，日寇这一企图是失败了。十一月以后，英国的军事力量，逐渐加强，纳粹不得不放弃其在英伦登陆的计划，地中海方面因西班牙拒绝参战，非洲法属地内自由法国运动扩大，再加上意大利进攻希腊开始挫败，英军地位，已转危为安。日寇原以为德意可以迅速获得胜利，事实是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所谓德意路线派，不能出头，而滇缅路开放后，英美援华更加积极，日苏关系亦并未见改善，在此有利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国抗战意志，愈形坚决。因此日寇不得不改变其原来的企图，暂时延缓南进的军事冒

险，而用全力向中国进行政治攻势。十一月十三日敌御前会议，讨论「中国事变」决定继续向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和阴谋。如诱和不成，则承认汪逆伪组织，以使中国内部发生分化。南宁寇军的撤退，便是日寇诱和阴谋的一部分。在十一月中旬，和平的谣言盛极一时。日寇放出空气，只要中国走上『和平』的途径，日本可以交还占领区，恢复七七原状。但我最高统帅，坚持抗战到底，不为所动，于是到十一月底，日寇不得不把汪记班捧出台来，与汪逆签订条约。另一方面，增调军队，扫荡华北游击区。在这时候，中国内部正因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移防问题，国共间引起争执。日寇有隙可乘，所以在军事上，停止对华中华南的进攻，专向冀察晋边，进行扫荡，在政治方面强调和平共存，外交方面派野村使美，芳泽使荷印，以求缓和英美对日反感，便于结束『中国事变』。

可是汪记班并不能叫座，国共虽有磨擦，亦决不至分裂。日寇这一企图又失败了。国际形势也起了变化，意军在阿尔巴尼亚与北非迭次溃败，纳粹无法援手。英国海军空军渐占优势，因而在远东的威望提高。加以罗斯福发表「不让民主国家投降」的演说，且在国会提出了军用品租借法案。日本不但无法趁火打劫，而且眼看着美国在太平洋防务的增强，对日寇的威胁异常严重。预算增加到一百二十万万，公债增加到二百余万万，而陷在中国的泥足，却依然不能拔出。谁都明白，日本帝国主义已临到最后的严重危机，日落西山的时候已快到了。

因此日寇不能不作最后的孤注一掷，寇陆相东条只好急急忙忙召集了退职军长老的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内外的危急局势。怎样应付危急局势呢？不外两条路。或者再来一次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不然就是加紧对中国的政治进攻。

就目前敌人的军事动态，一面是在广州市内及四周增兵，其

目的显然是在进攻韶关，打通粤汉路，一面则在鄂北鄂西，集中四师团兵力，向襄樊包围，其目的又显然是在进窥长江上游，威胁四川。自然，敌人军事进攻的新企图，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因为鄂西北粤北与湘北，华军都有严密的布置与多次的作战经验，再不会给敌军得到便宜。现在比敌人的军事进攻更为可虑的，乃是敌人的政治进攻。假如我国内不能更进一步团结，政治不能更进一步改善，则抗战虽有最后胜利的绝对把握，但是前途，依然不免遭遇一些困难和波折。

无论如何，在目前，日寇的大规模的军事南进是不可能成为事实的。日寇可能占领西贡，可能扩大越泰冲突，但在中日战争未结束之前，断不敢进窥新加坡与荷印，以促成太平洋的真正大战。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依然是中国的抗战，因为要保卫太平洋，必须首先保卫中国。

（载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南洋商报）